高原上的愛與慈悲：拉達克與流亡藏人

成大醫學院 STM 研究中心 / 盧佳慧

今年七月，因緣際會之下我前往北印度拉達克擔任志工。出發前恰巧看到公視「獨立特派員」的專題重播《邊界異域：拉達克的戰爭與和平》，才知道拉達克隸屬印度查模 - 喀什米爾邦（以下簡稱查 – 喀邦），與中國、巴基斯坦不時引發邊界衝突，二月才發生過嚴重空襲，而就在完稿的前幾天（8月5日），印度廢除了《憲法370條》，收回查 – 喀邦的特殊自治地位，並將全境封鎖、派駐大批軍隊，同時又將拉達克劃為中央政府直轄區，令拉達克從此與查 – 喀邦脫離，用以抗衡中國。

在這些一觸即發的國際政局之外，我還知道拉達克素有小西藏之稱、是藏傳佛教的重要據點，境內有許多流亡藏人。當1959年達賴喇嘛與八萬藏民選擇流亡的同時，另一批藏民沿著中印邊境的高山來到拉達克。

我曾在多年前入藏，那是藏人抗暴之後（2008）沒多久的事。拉薩的街頭佈滿士兵和碉堡、巷弄裡還留有血與火的氣味。然而每個清晨時分，藏民會一波波湧現在街道上，以大昭寺為中心順時針「轉廓」，當天空泛白的時候，他們又像潮水一樣安靜退去，只剩煨桑的裊裊之煙，以及磕長頭的清脆擊掌聲……。在這樣的世界觀裡，現代戰爭雖在身邊卻又彷彿遙不可及，被濃濃藏傳佛教信仰包裹的心靈，純粹單一，彷彿沒有雜念。

一直很渴望能再返回香巴拉、再次經驗這樣的單純心志，這次的拉達克之行某種程度也算入「藏」，卻讓我見識到了完全不同的風景。

Jamyang School與達賴喇嘛

在飛行加轉機超過24小時的旅程之後，志工團抵達距離列城機場約2.5公里的Jamyang School，這是一所由十四世達賴喇嘛所資助建立的學校。在這個地形高峻險惡之所，由僧侶所創辦的學校並非沒有，但由流亡政府一手擘畫的教育機構，應該僅此一間。創辦的原因主要是拉達克少數族群Brokpka人的請求，這群相傳是亞歷山大帝東征時留在印度的士兵後代，素有「純種的亞利安人」之稱，然而在近代飽受伊斯蘭教干擾的情況下，族人向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請願，希望能夠協助保存傳統信仰與文化、提供偏遠地區貧苦孩童一個受現代教育及學習佛法的機會。[1]

1 參考潘美玲，〈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五張：重返拉達克：Jamyang School〉，芭樂人類學網站（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13）

Jamyang School的兩位創校者，Geshe Lobsang Samten與Geshe Tsultrin Tharchen，皆是南印度哲蚌寺的高僧，在2003年取得格西學位之後（藏傳佛教最高學位者之尊稱，等同現代教育中的「博士」）返回家鄉拉達克傳授佛法，在接受達賴喇嘛的請託之後，開始籌措建校計畫，並於2008年正式運作。在學校開始運作的前兩年，達賴喇嘛基金會承諾負責全部的費用，但自第三年起，學校需自籌一半的費用。這也是Jamyang School亟需慈善捐款的原因，而兩位Geshes則從未收過一分一毫的薪資。

這所學校有兩個基本精神，一是「Free Education」。由教師所組成的遴選委員，會主動到偏鄉地區尋找有所需求的學生，孤兒、單親，或有經濟困難家庭的孩童優先，因為在Jamyang School一切學費、食宿全部由學校提供。

在〈Most Dangerous Ways to School〉一系列跟拍世界偏鄉兒童如何上學去的記錄片中（公視譯為《冒險上學去》，不定時放映並有DVD發行），「喜馬拉雅- 印度篇」的主角便是Jamyang School的學生Motup。當我在學校中遇見他時，幾乎要流下眼淚。影片中那個小不點大、徒步拔涉一百多公里只為求學、尋找夢想的小男孩，如今已是成績名列前茅、入選超級菁英大學印度理工學院（IIT）高中生暑期研習營的成熟大人樣貌。他告訴我，若不是Jamyang School，他如今會在高原上牧馬、協助父親務農，他將不懂英文、不懂閱讀、不懂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他將來想當生醫科學家，並且，他的眼神堅毅：「不論我到了哪裡，一定會回來，盡所能地回報給學校。」

Jamyang School的另一個基本精神，則是在現代教育之外（數學、科學、英文等），加入佛法義理的教誨（teaching）。格西對我們說，佛法並不是那麼「宗教」的東西，它是一種心靈的科學（science of mind）。它是日常生活的行事準則、思維模式，它是正念、同情心、幫助他人，例如，如何當一個更好的人。

我們請求格西在每天早餐後，也給我們一個三十分鐘左右的teaching，主題有如：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何謂快樂、真實（truth）為何、心志與身體等等。每回聽講完，我總覺得羞愧與懺悔，彷彿現代社會中那些懷疑、不滿、憤怒的面貌被揭露出來，而我衷心祈求它們能夠在這高原沙漠中化為塵土。

學校。

學校。

拉達克的沙漠與綠洲。

班公錯。

每天早上清晨五點是學生們的起床時間，五點半開始梵唄與靜心。我總是也跟著醒過來，看著窗外高年級的學生牽著低年級學生的手，一同到成排的水龍頭旁集體梳洗，大姐姐幫小妹妹綁頭髮編辮子、大哥哥幫小弟弟擦鼻涕擰毛巾，在這樣自然條件嚴苛的環境中，停水與斷電已是日常（我在當地的只洗過一次熱水澡），然而他們用富足的心與互助的愛，滿滿填飽了物質空缺的隙縫。

拉達克與西藏在歷史、文化、宗教和貿易上，自古以來便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不僅從九世紀到十四世紀的拉達克王國是由西藏王室成員西逃後所建，雖然後來在十五世紀被推翻，至十七世紀末又與西藏簽訂條約，成為藩屬國。直至十九世紀，這塊飄著風馬旗、山頂白雪終年不化的人間淨土，終於在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擴張與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雙重壓力之下，成為中、印、巴三國邊界未定的多事地帶。[2]

班公錯：一場驚險的風波、三種文化的衝擊

當2009年印度電影《三個傻瓜》上映造成一股寶萊塢旋風後，片尾女主角騎著速可達找到藍丘的地方，那個宛如人間仙境般的湖光山色，班公錯（Tso，湖之意），便一夕成名。班公錯位在中印邊界，是海拔4242公尺的高原湖泊，三分之二隸屬中國，三分之一隸屬印度。成名帶來的是觀光人潮與商機，卻也不斷加重生態失衡的危險。[3]這種危險不僅表現在生態、環保、資源不足的囧境上，也同時產生不少文化衝突，我便親身經歷了一場驚險的風波。

當我抵達波光粼粼的湖邊、正想好好一個人在沙岸上散步，朝著東方思念山那頭西藏阿里的藏族朋友時，八、九個穿著重金屬背心、皮褲的印度痞子，扛著巨大音響、大聲播放著印度流行歌曲，直直地從後方追上，並且就在我的正後方、與我保持著大約三步的距離、同步前進著。我忍受了五分鐘，再也無法再忍受下去，轉過身對著他們說：「Could you please turn off the music?」

下一秒鐘，便被這八、九個痞子密不透風地團團包圍，我腦袋閃過印度婦女被行刑、強姦的新聞畫面。也在同時，Jamyang School的祕書（流亡藏人）與總管大大（拉達克人）衝進人群將我拉出去。祕書正色跟我說，我做了非常危險的舉動，他雖然沒有多說什麼，但我已經可以猜測到，在階級和性別劃分明顯的印度社會，一名東方女子居然敢挑戰印度男性？我轉個身，則看見總管大大以嚴肅但不壓迫的口吻，向他們解釋這裡不僅是軍事管制區，亦是野生動物保護區，他們的行為不僅不被其他遊客接受，也不被法律允許。

2 1834年，由英屬印度政府支持的錫安帝國出兵攻打拉達克，拉達克兩度向西藏求援，駐藏大臣拒不發兵，拉達克終在1839年成為查謨邦的附屬。1842年拉達克起義失敗，被納入查－喀邦。其時，正值清末鴉片多事之秋、鴉片戰爭正如火如荼展開，道光皇帝默認喪失了拉達克的宗主權，儘管後來拒不承認。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拉達克與喀什米爾一併也交給了印度，然而中共仍舊宣稱拉達克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火線邊界一觸即發。詳細拉達克歷史，可參考潘美玲，〈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三張：拉達克〉，芭樂人類學網站（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2188）與Kanai Lal Hazra, *Ladakh: A Buddhist Populated Region*. Delhi: Buddhist World Press, 2012.

3 有關《三個傻瓜》之後班公湖的生態衝擊，公視「獨立特派員」亦編有專輯詳加討論，見https://innews.pts.org.tw/?p=7030

他們悻悻然將音樂關掉，朝下方湖水走去。孰料，五分鐘後他們又開始大聲播放起音樂、嘻鬧不休。拉達克總管也沒在客氣，追上去，再次教誨一番，這回印度人真的將音樂關掉了。

我一直在猜測，這場小小的驚險風波，所反映出的是否正是這塊土地上，三種文化族群的人，在社會現實各層面中的姿態與存活策略？拉達克人是印度人、也是拉達克地區的主人，那群印度痞子在主人面前自是退縮三分；流亡藏人長年寄人籬下，忽略或妥協，成了明哲保身的方法；至於那群不守規距的印度人呢？大概是每個社會都會有的、身為主流社群卻忘了尊敬與謙卑的那些人。

難民村。

流亡藏人難民村及其醫療需求

我們開車來到距離Jamyang School西南方約一小時車程的地方，這裡是Tibetan Refugee Settlement Agling Camp，我們要尋找「Camp 6, House 66」，這是我們想去參訪的難民營地址。

這是個規模頗大的難民聚集地，總共有11個camp，每個camp約1~200人，當司機詢問第六營地在何處時？竟然沒有半個路人可以回答。後來我們才明白，這裡的居民憑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熟識度來記憶，而不是門牌號碼。

正在德里唸大學的Rinchen已在門內等我們，她帶我們走過她從小生活長大的六號難民村、小學、難民心靈寄託中心的stupa（佛塔），繞了一圈返回她的家中用餐。在難民村中行走的感覺非常特別，這裡是沙漠、綠洲很遙遠，滿眼盡是黃褐色的塵土飛揚，村口還被挖了個大洞，村民們正在鑿水。但你只感到口渴、卻不感到貧困。人很少，幾乎沒有人，年輕人都到城裡上學、工作去了，疴僂著背的老婆婆搖著轉經筒經過我們，Rinchen握住她的手，大聲在耳邊說著藏語，老婆婆終於聽懂了，朝我們笑了笑：「扎西德勒！」爾後因缺水而上街買飲料的小男孩，遠遠也露出燦爛的笑容，朝著我們大叫：「扎西德勒！」

來自同樣難民村的Tenzin主動來拜訪我們。他曾在2010、2012及2014負責接待與規劃臺灣醫療團至Agling難民村進行醫療協助與服務，可惜2014年之後，醫療團再也沒有出現過。他急切地渴望有人伸出醫療援手，並且很具體列出難民營主要的需求：口腔保健（dental care）、視力檢查，以及老人膝蓋退化與骨質疏鬆。臺灣每年皆有醫療志工團赴拉達克進行醫療支援計劃，如陽明大學與台大醫學院，然而這片在沙漠中的流亡藏人社區，似乎是被遺落了。風捲起了黃沙，但Tenzin黝黑的臉龐上，卻目光炯炯、鬥志高昂。

結語：搖曳風中的希望

達賴喇嘛與藏人已經在外流亡六十年了，第三代流亡藏人已經出生，每個藏人都祈求達賴喇嘛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因為沒有人敢想像，失去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會變成什麼樣子。世居印度，但他們是外國人、每年都要去印度民政單位重新renew自己的身份ID。然而他們不願入籍印度，深怕自己的文化逐漸被稀釋，最後忘記自己是誰。他們上大學之前都接受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體系（即Tibetan Children Village, TCV），學習藏文與英文；各憑本事上了大學之後，則被視為外國學生。一個一個的西藏村變成流亡藏人的避風港，在連次等公民都談不上的流亡身份底下，未來他們將走向何處？

我在拉達克總共待了十五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拉達克與藏人朋友們交織而出的日常生活裡，不時充滿歡笑。歡笑的背後閃爍著希望，這希望在傷痕中茁壯，在苦難中成熟。風中經幡傳遞著愛與慈悲，要說拉達克的「藏」味，其實一點也不拉薩，這已全然是另一番風景。